

文化翻譯：後現代、後殖民 與解嚴以來的台灣文學

劉 亮 雅

摘 要

自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來，在台灣文學場域裡先是有後現代，接著則是後殖民引領風騷，兩者很長時間各擁一片天，彼此角力或合作，時而產生中間混雜地帶。參與後現代與後殖民熱潮者從學院裡的外文系、比較文學、中文系等科系學者，到新銳或重量級文學家、批評家，到主導文學風向的副刊、雜誌、期刊、出版社主編與編輯。後現代與後殖民理論都來自西方，引進台灣必然涉及文化翻譯問題，以及它們與台灣既有的思想和傳統的連結關係。尤其後現代，甚至引發移植方式適切性的論辯，廣泛來說後者也屬翻譯問題。本文試圖對後現代與後殖民的翻譯效應做歷史脈絡式的研究，並探索此文化翻譯如何主導解嚴以來台灣文學，兼及放到文化層面看待此文化翻譯。我將探討：翻譯的後現代與翻譯的後殖民涉及了哪些論戰、議題、效應和影響？兩者所激盪出的多元身分認同又包含哪些議題和交鋒？而媒體和出版生態在後現代與後殖民熱潮中扮演什麼角色？又如何影響了文學書寫？

關鍵詞：文化翻譯，後現代，後殖民，解嚴，1987 年以來台灣文學，多元身分認同，媒體，出版生態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 本文 94 年 9 月 19 日收件；94 年 10 月 12 日審查通過。

Cultural Translation: Postmodernism, Postcolonialism, and Taiwanese Literature since 1987

Liang-ya Liou *

Abstract

In Taiwan literary field, postmodernism has been a phenomenon since the mid-1980s, followed by postcolonialism since the early 1990s.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both postmodernism and postcolonialism have been dominant, competing or cooperating with each other, while they have also blended in certain forms. Participants in the phenomena of postmodernism and postcolonialism include scholars, writers, critics, editors, and publishers. Since both postmodern and postcolonial theories came from the West, their introduction to Taiwan involves issues such as 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heories and Taiwanese cultural tradition. Postmodern theories, in particular, stirred up debates about their applicability to Taiwan, which is a translation issue as well. This paper seeks to do a genealogical study of the effects and influences of the translation of postmodern and postcolonial theories and explore how the translated postmodernism and postcolonialism have dominated Taiwanese literature as well as culture since 1987. I will discuss the following issues: (1) the debates, issues, effects and influences that are involved in translating postmodernism and postcolonialism; (2) the issues and debates that are involved in the multiple identities that are generated from the convergence of postmodernism and postcolonialism; (3) the role the media and the publishing business play in the phenomena of postmodernism and postcolonialism as well as how they affect literary writing.

Keywords: cultural translation, postmodernism, postcolonialism, the lifting of the martial law, Taiwanese literature since 1987, multiple identities, the media, the publishing busines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自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來，在台灣文學場域裡先是有後現代，接著則是後殖民引領風騷，兩者很長時間各擁一片天，彼此角力或合作，時而產生中間混雜地帶。參與後現代與後殖民熱潮者從學院裡的外文系、比較文學、中文系等科系學者，到新銳或重量級文學家、批評家，到主導文學風向的副刊、雜誌、期刊、出版社主編與編輯。後現代與後殖民理論都來自西方，引進台灣必然涉及文化翻譯問題，以及它們與台灣既有的思想和傳統的連結關係。尤其後現代，甚至引發移植方式適切性的論辯，廣泛來說後者也屬翻譯問題。

凡是翻譯，必然要問為什麼翻譯？最常見的看法是西方強勢文化帶來的衝擊：不論是將之看做西方文化帝國主義入侵，或是台灣不能自外於國際社會普世思潮，或是台灣需要學習西方才能成為先進國家。由於 1949 年到 1987 年國府戒嚴時期的中國中心文化政策與思想教育，刻意抹煞台灣多重複雜的殖民歷史，尤其日本殖民的影響；而另一方面，在中國國共內戰中失敗來台的國府政權，又是靠著被納入冷戰反共結構、在美國的扶持下而建立其代表中國正統的合法性。於是國府便以反日¹和親美為政策，雖然私底下國府對日本的態度曖昧，在諸如公賣制等方面延續了日治時期的體制，更不消說在經濟上繼續與日本密切合作。² 正由於親美的政經和文化結構，因此即使是戒嚴令之下的鎖國時期，也容許某些西方思潮的引進；但也因此，無論六〇年代的現代主義和八〇年代的後現代主義之引進，都引發是否只是模仿學舌的辯論。然而這不是唯一解讀的方式。在戒嚴時期，引進西方思潮具有鬆動威權政治之效，而八〇年代中期以來大量西方思潮的引介，在當時國內外局勢的變化下，則伴隨著知識分子希圖終結戒嚴體制、企望台灣成為多元民主社會、重新釐清台灣的國家身分之隱然願景。

本文試圖對後現代與後殖民的翻譯效應做歷史脈絡式的研究，並探索此文化翻譯如何主導解嚴以來台灣文學，兼及放到文化層面看待此文化翻譯。我將探討：翻譯的後現代與翻譯的後殖民涉及了哪些論戰、議題、效應和影響？兩者所激盪出的多元身分認同又包含哪些議題和交鋒？而媒體和出版生態在後現代與後殖民熱潮中扮演什麼角色？又如何影響了文學書寫？我將先由陳芳明新台灣文學史引發的論戰開始。



¹ 1946 年國府宣佈禁用日文，而有關禁止日本音樂和電視節目的禁令則直到 1994 年才撤除。

² 日本帝國時期，日本以西方帝國國家為標的，現代化的程度遠遠領先其他亞洲國家，成了亞洲中的西方。而「由於台灣是日本第一個殖民地……相較於韓國、滿洲國、南京，台灣是日本殖民政權的試驗場」（廖炳惠 2001b: 275），因此日治時期台灣的現代化邁入新階段，而這些建設也被國府所接收。此外，日治時期的台灣知識分子不乏透過日本接觸西方思想。

一、陳芳明新台灣文學史引發的論戰

如果把解嚴以來台灣文學視為「後現代與後殖民時期」，首先便需討論陳芳明和陳映真在《聯合文學》雜誌上對此的論戰和呂正惠的相關討論。陳芳明的新台灣文學史將此時期看做是「後殖民時期」，因為他認為戒嚴體制下台灣社會是「再殖民時期」，由「漢人／中原心態／男性優勢／儒家思想所凝鑄而成」，無法容忍背離於此的思想，而解嚴則讓台灣意識文學、女性意識文學、眷村文學、原住民文學、同志文學崛起（2000a: 165）。陳映真一方面不贊成把戒嚴時期看做是「再殖民時期」，當然也就不能接受把解嚴後看做是「後殖民時期」，對他而言，階級與左右派之間的鬥爭永遠是最重要的。另一方面，他則認為「把台灣文學按照『語言』、『族群』、『性別』、『性取向』、『去中心』、『分殊』、『多元』加以分別」乃是後現代主義，而非後殖民主義（2000: 158），他認為這種後現代主義乃是由西方引進的舶來品，也是一種新殖民主義，因此不贊成，他並且認為陳芳明混淆了後殖民與後現代（2000: 158-59）。

我則認為，有關第一點，涉及不同意識型態立場：陳芳明從台灣主體性出發，批判國民黨政權透過政治及文化上對台灣閩、客、原住民的宰制所具有的殖民性格（2000a: 161-62），在論證上大致成立，不過陳映真挾其左翼統派觀點，認為台灣只是中國的一部分，則當然無法接受。這個爭議背後既有統獨之爭，也涉及了台灣文學正典化之爭，正好反映了在台灣身分認同的複雜性。³ 另一方面，邱貴芬指出，陳芳明的理論有點混淆了政治與文化上的後殖民，就政治上，台灣即使解嚴後也尚未完全去殖民（2003b）。廖炳惠便指出，對於認同中國的人而言，1945 年日本投降，台灣便已是後殖民；對於本土派而言，遲至 1987 年解嚴，台灣才進入後殖民；而原住民族群則被排除於民族主義和後殖民的討論之外（Liao 1999: 200）。換言之，對原住民族群而言，解嚴只是走向後殖民的開始。⁴ 有關第二點，不管陳映真直接不接受，多元身分認同和去中心成為解嚴後文學主要的主題意識，乃是顯而易見的事實。陳芳明以後殖民概括性別和性取向身分，雖然並不適當，但陳映真認為這僅是

³ 但陳映真提出對階級關係的重視也是重要的。

⁴ 此外，針對大統派（不論新黨或左翼）認為台灣尚未脫離日本殖民勢力及美國新殖民主義（Liao 1999: 199），亦需指出：正因台灣曾多次被殖民，自古台灣文化便呈現「『跨文化』的雜燴性格」，並無「純粹」的台灣本土文化、語言之存在（邱貴芬 1995a: 233）。史碧娃克（Gayatri Spivak）也說過，後殖民主體乃是對他／她所親密居住的殖民主義結構做批判，說一個「不可能的『不』」（the impossible “no”）（1993: 60, 280-81）。

後現代，則忽視了在台灣的族群身分所涉及的殖民與被殖民關係，也忽視後現代對於身分認同的曖昧懷疑。此外，正如原住民在解嚴後仍尚未完全去殖民，同性戀也尚未完全得到公民權和結婚權。在政治及社會經濟型態上，解嚴後台灣社會不能算是全然後殖民與後現代，然而這並不影響它們成為解嚴後文學的重要主題，因為文學經常引領思想風騷，而且正如呂正惠指出，戰後台灣文學主要由知識分子所創造（1995b: 16）。因此，綜合他們的交鋒，我認為解嚴以來台灣小說既有後殖民，也有後現代。

呂正惠更早的一篇文章，從文學典範和意識型態改變之角度，也隱約注意到後殖民與後現代主導了解嚴後文學。他指出，「台灣文學論」原本起源於 1979 年美麗島事件後的省籍矛盾，由本土反對派知識分子所發起，到了八〇年代中、後期，卻由於中共的威脅，逐漸為一般人廣泛接受，適用性擴大，不再是狹窄的本土論。「鄉土文學」的「鄉土」被「台灣文學」的「本土」所取代，原有的左翼色彩消褪。另一方面，「新左派」則取代了鄉土文學左翼，但尊奉西方馬克思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有別於七〇年代左翼的「鄉土」色彩（1995a: 83-84）。換言之，「台灣文學」脫離於「中國文學」，正顯示台灣從大中國中心轉向台灣意識，但此一後殖民轉向並未落入狹窄的本土論；而後現代主義則是「新左派」所抱持的。不過，反過來看，後現代主義似乎又未必都植基於西方新左派的批判精神。在〈戰後台灣知識分子與台灣文學〉文中，呂正惠則指出，八〇年代新世代知識分子很難成為中國民族主義者，而認同台灣的新世代除了本土派，便是後現代派。後現代知識分子又分兩類：一類具享樂主義傾向，高度認同台灣在資本主義消費方面的進步，認同現存體制，甚至認為台灣已是後現代社會；另一類則高度肯定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希望結合弱勢力量繼續反體制。這兩類都認同台灣，但不像本土派那樣，對台灣「建國」問題懷有「民族主義」或宗教狂熱（1995b: 35-36）。我認為左翼統派的呂正惠雖有洞見，卻忽視了中國中心主義依然強固。而他說的兩類後現代知識分子在九〇年代也有，大抵他們都是新世代，不少人跨越了兩類。雖然某些第一類後現代知識分子把八〇年代台灣視為高度資本主義化的後現代社會有待商榷，然而他們倡揚一種重表層、消費、去歷史深度的思維，使得「後現代」在台灣的意含有時也與資本主義價值取向結合。

有關後現代主義在意識型態上傾向西方，引發是否適用「後現代」描繪台灣文學？「後殖民」是否較適當？陳芳明曾在〈後現代或後殖民〉文中主張後現代主義是舶來品，在台灣並沒有歷史根源，不適合說明台灣文學現象，後殖民主義才根源於台灣（2000b: 55-57）。陳映真則批，按照陳芳明的邏輯，後現代的去中心、

多元難道不也是挑戰戒嚴體制的一元化專制(2000: 159)?我認為雙方各有其洞見及盲點。「後現代」和「後殖民」兩詞都來自於西方,西方的後現代與後殖民理論分別在八〇年代中和九〇年代初傳入台灣,但後殖民主義(即文化上的去殖民),誠如陳芳明指出,早在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已出現。後現代主義,則如陳映真指出,雖屬舶來,卻也挑戰戒嚴體制的一元化;儘管它被引入台灣後發生某些誤用的情形。換言之,文化上的後殖民主義根植於本土的反抗精神,解嚴對此推波助瀾;1988年開放大陸探親、兩岸交流則加深被「中國」統一的焦慮(呂正惠 1995b: 34)。而後現代主義,則如同現代主義,被引介進來且蓬勃發展,與其說是西方新殖民主義的展現,不如說蘊含了鬆動戒嚴體制的企求。解嚴後不論在文化或文學上,後現代與後殖民其實有所交織,雖然也有交鋒。

本文想要指出:後現代與後殖民的並置、角力與混雜,不僅可以描繪解嚴以來台灣主導文化的思想氛圍以及解嚴以來台灣小說的主題意識,同時也可以描繪這些小說裡的新美學。也就是說,文化思想、主題意識和新美學三個層面都展現出後現代與後殖民的並置、角力與混雜。透過西方理論的大量引介,政治解嚴,媒體的開放、競爭,社會運動的活絡以及文學行銷的日趨商品化,文化和文學兩者間頗有交相影響之處。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主義引進台灣大約和西方同時或稍晚,然而它們在台灣所引起的效應及影響力依然屬於台灣特殊的時空。台灣的後現代與後殖民都強調去中心。但它們又代表兩種不同的趨向,彼此合作或頤抗:台灣的後現代主義朝向跨國文化、雜燴、多元異質、身分流動、解構主體性、去歷史深度、懷疑論、表層、通俗文化、⁵ 商品化、(台北)都會中心、戲耍和表演性;而台灣的後殖民主義則朝向抵殖民、本土化、重構國家和族群身分、建立主體性、挖掘歷史深度、殖民擬仿、以及殖民與被殖民、都會與邊緣之間的含混、交涉、挪用、翻譯。由於台灣內部的需求,解嚴以來兩者之一都並未形成主導,而是兩者的並置、角力與混雜形構了主導文化及文學的內在精神。由於兩者的激盪,在小說裡,有關於女性、同性戀、原住民、眷村、甚至馬華等多元身分以及國族歷史記憶、都市、情色、科幻、跨國性的主題特別多見。此外,後現代與後殖民的混雜和角力也成就出特殊的美學,因此這個時期的小說除了吸納、延續了現代主義及寫實主義,又特別強調後設小說、私小說、反諷、諧擬、雙重聲音(double-voiced)敘述、真實與虛構的混

⁵ 根據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關鍵詞》(Keywords)裡對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的定義,「通俗文化」既包含來自草根的庶民文化(folk culture),也包含透過大量生產、分發、消費的大眾文化(mass culture)。既包含被貶抑於精英文化之外低劣的文化產品,也包含許多人都喜愛的東西(Williams 1976: 237)。後現代所重視的通俗文化比較是原來被貶抑於精英文化之外的文化產品,並藉此打破精英、通俗之分。

雜、魔幻寫實、夾議夾敘、文類糅雜、表演性、拼貼。男作家包括張大春、林耀德、駱以軍、舞鶴、楊照、紀大偉、張貴興，女作家包括朱天心、李昂、朱天文、施叔青、邱妙津、平路、成英姝、賴香吟、陳雪、洪凌都可以為代表。接下來我將對後現代與後殖民的翻譯效應做更細緻的脈絡式探討。

二、翻譯的後現代

後現代在台灣是一個複雜的引介、誤用、挪用、重新發明的現象。大致它分為兩波引進台灣。第一波是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羅青、蔡源煌、林耀德、孟樊等引進後現代主義理論，林耀德書寫後現代詩，張大春書寫後現代小說，1987年哈山、詹明信先後來台訪問演講，他們及李歐塔、布希亞的論著陸續被翻譯，引發後現代熱潮。第二波則是九〇年代初期張小虹、何春蕤、卡維波引進酷兒、女性主義性解放理論，帶動高度展演、戲耍的酷兒、女性主義性解放運動，紀大偉、洪凌書寫酷兒小說。就其發源地而言，第一波一方面挑戰模擬再現觀的美學技巧，另一方面又常被連結到後結構主義對啟蒙和現代性之基本假設的顛覆，西方大論述諸如「理性、進步、統一主體、歷史連續性、語言透明性——被推翻」，第二波則「與女性主義、黑人、同性戀、後殖民等當代理論產生極大關聯」（劉亮雅 1998: 17-18）。這兩波不同意義的後現代在西方都有其思想發展脈絡，引進台灣多少有些去脈絡。例如台灣並無西方那樣深固的模擬再現觀和現代性及理性主義傳統，足以讓人顛覆，反而是戒嚴體制下包含反攻大陸、中國中心、國語政策和勤儉報國的大論述，以及其所挾帶的對國家認同、情慾、性別、族群、感官、消費等議題的壓抑，自八〇年代起因國內外政治環境改變及台灣經濟起飛而受到挑戰，因此台灣後現代的去中心、多元不但在意含上不盡同於西方，且必然與台灣後殖民有所牽纏，儘管台灣的後現代知識分子多半不願觸及國族議題，並多半藉後現代側面回應或消解比它更早存在的後殖民。⁶ 又例如西方同性戀運動起於 1969 年，到 1990 年另外發展出酷兒運動，且同性戀運動在其發展過程中與也是起於 1969 年的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之間頗多衝突嫌隙。但台灣在解嚴前同志運動談不上任何組織，九〇年代初同性戀運動與酷兒運動相隔兩三年開始蓬勃發展，且都受到台灣女性主義運動很大幫助，直到 1995-96 年才與女性主義運動產生衝突。

透過與媒體的合作，不論第一波或第二波後現代都相當程度與商品邏輯勾連，

⁶ 我指的是八〇年代初已開始的本土化運動。

使其戲耍展演成為時髦，例如八〇年代媒體寵兒張大春對後設技巧的耍玩便被視為過於知性傾向的賣弄和特技表演，甚至內化了「商品美學機制」（黃錦樹 2003: 232）。不少人指出第一波後現代主義有時被去脈絡地誤用。1990 年羅青逕稱台灣那時已邁入了後期資本主義的後現代社會，陳光興斥以為缺乏實際本土脈絡考量，他批評當時的後現代主義台灣版「沒有發展出它的問題性，提出具有批判性、自主性的論點」，因此「顯得膚淺而空洞」（1990）。陳芳明也批評台灣某些人士倡導的後現代版本，乃是去除了西方歷史經濟條件的挪移，未必能概括八〇年代以後台灣文學的性格；後殖民反而更能描繪目前台灣的文學與文化狀況（2000b: 55-57）。廖炳惠則指出楊茂林、鍾明德、林耀德與羅門等後現代理論家對後現代主義只是「一知半解」，他們一方面想要「挪用後現代主義的手法或標籤」，另一方面又陷於歷史文化無法完全對應、互相指涉的困境及焦慮，因此只好對後現代主義加以「修正、揚棄」（2001a: 133-34）。誠然，後期資本主義的後現代社會需以長期、高度民主化為前提，但這確非台灣當時的狀況；即使以 1990 年經濟條件，這大概也僅足以描繪都會區中上階級。弔詭的是，作家如張大春、朱天文、朱天心、駱以軍、成英姝、施叔青、林耀德、邱妙津、紀大偉往往在小說中刻畫台灣已是高度資本主義化的後現代社會，呈現新興族類如雅痞族、電玩族、飆車族、酒吧族、同性戀、粉領族、紅酒族，但如此一來其所呈現的便常侷限於（台北）都會，尤其新世代的次文化。去脈絡地挪用後現代更大的尷尬在於它往往僅能非常浮面地挪用後現代主義手法。⁷ 然而後現代的進步性應在於其解構、去中心的思維，恰恰呼應了當時台灣集體潛意識裡的去中心、企求多元文化的欲求。九〇年代，加入了解嚴的衝擊，各種社會運動包括學運、女性主義、同志、原住民、環保等的蓬勃，讓台灣的後現代出現另一番發展和變貌，更強調邊緣、表層、異質、戲耍、雜燴、擬仿等概念，也刺激大量有關女性情慾和同性戀主題的小說的出現。然則許多後現代知識分子刻意解構主體性、耍玩身分流動、去歷史深度，又使得任何身分認同都變得不可能。

八〇年代以來台灣日漸由中國中心轉向台灣中心，民主化與本土化已成為大勢

⁷ 被廖炳惠調侃為「後現代大師」的林耀德在他與孟樊合寫的《世紀末偏航》（1990）總序裡，似乎自覺到此一尷尬而提出反省：「八〇年代的文學主流是後現代主義嗎？……用當代的角度來看，在這個階段我們『發現』並且『創造』了所謂的『後現代主義』。……然而，後現代主義的出現並未蔚成這段文學史上真正的主流，它的意義在提出另一種『文學創作方法』及『如何看待文學』的選擇」（1990: 10）。如果後現代侷限於文學技巧和再現模式，則難怪它無法蔚為文學史主流。像張大春、平路藉後設小說諷刺戒嚴時期官方媒體掩蓋真相，或紀大偉、洪凌藉後設小說諷刺自以為異性戀者掩飾其同性慾望的真相，這種後現代對語言再現真實的懷疑有其力道。然而不少作家無法將此後現代的哲學關懷連結到任何議題，而只是趕流行地賣弄後設技巧，一再重複而疲態畢露。

所趨。在這樣的氛圍下，後現代去中心、多元對於台灣社會的意義，就必然含納 1987 年解嚴及其後李登輝主政所代表的後殖民意涵。後現代與後殖民之間應有含混交織之處，但許多後現代知識分子卻規避於此，反而藉後現代去側面抵銷後殖民的衝力。因此又有一些後殖民知識分子參與改寫後現代，正如有些後現代知識分子收編本土化運動。這些角力持續不斷，也形成了中間游離混雜地帶。廖炳惠對後現代的重新論述便試圖發展台灣版後現代的問題性。他暗示後現代總已與後殖民並置；後現代對於去中心、多元文化思想的企求，總已在對應後殖民對於重新建構國族身分的欲求。廖炳惠指出，在「翻譯（或移植）後現代過程」中，台灣社會有其「具體欲求、挪用策略及其再詮釋的歷史脈絡」（2000: 92）。他進一步解釋：翻譯後現代毋寧可視為台灣社會「文化無意識的欲求，希望透過找尋某種對應架構，來理解台灣正形成的新社會想像（social imaginary），而且這種欲求與台灣社會長期以來身分的混亂、無以界定、乃至雙重邊緣化（遠離中華文化政治圈，又不被國際社會所承認）可能息息相關」（2000: 92）。1971 年台灣退出聯合國，到 1979 年台美斷交、中共與美國外交正常化，遂使得台灣成了國際孤兒，國民政府自接收台灣以來因被納入冷戰結構而得以以中國正統自居的正當性受到重挫。而 1979 年美麗島事件則讓本省知識精英感到長期以來外省人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宰制與壓迫，促發了政治反對運動和本土文化運動，進一步從更長遠的歷史角度重新詮釋台灣混亂曖昧的身分。在這樣的國際與國內情勢下，雖然翻譯後現代循著六〇年代翻譯現代主義同樣的策略：藉由引進西方先進時髦的理論或美學，私底下偷渡民主以及改變文化政治的企求，然而比起六〇年代的威權強人政治，八〇年代末期的政治空氣開放了許多，反對運動已成功地建黨，本土論也已檯面化，大量西方理論的引進使得言論不斷挑戰禁忌。翻譯後現代因此除了尋求豐富的多元文化空間、建立新的市民社會，在其背後也回應或參雜了後殖民尋找國家定位的動力；它試圖「促成某種新社會現實之敘事與實現方法」（廖炳惠 2000: 93），鬆動「舊道統的敘事體及其管轄管道」（廖炳惠 2000: 93）。因此，與其說後現代主義在 1987 年後獨領風騷，倒不如說它提供了比過去自由主義更多元、世俗、戲耍的文化展演和思想刺激，它與其他基進思潮如女性主義、同志理論、後殖民、本土論、環保、新馬克思主義的連結或／和論戰使得解嚴後對國家機器的批判前所未有的熱烈。張誦聖也說，「八〇年代末以來各種基進浪潮使一個幾十年來沒有左翼成分的社會耳目一新」（2001: 201）。以上這些看法需要放回到歷史脈絡加以考察。

嚴格說來，由國府開始主政到解嚴，中間並非完全沒有左翼思想。1977 至 1978 年鄉土文學論戰便是把被壓抑的左翼思想透過文學論戰抒發，王禎和、宋澤萊、陳

映真、黃春明等的小說，著重對下層社會現實面的披露，多少都具有左翼精神。然而這樣的反對聲音在以反攻大陸為目標、一黨獨大、一言堂的戒嚴時代畢竟十分微弱。或許我們可以說，戒嚴時期的政治是右翼主導，自由主義則是主要批判的力量，然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承擔的風險極大，連雷震都因《自由中國》而繫獄。在這樣的氛圍下，左翼則更不消說受到鉅大打壓。張誦聖認為，在國府威權政治下，主流文學是「軟性抒情的文學」（2001: 197），受制於「主導文化體制所認可的內向化，新傳統主義，和抒情的藝術視野」（2001: 54），以便「建構一種正面的、保守的、尊重傳統道德的教化性主導文化」（2001: 113）；而六〇年代現代主義運動和七〇年代鄉土文學運動也許是相對於主導文化的「異向的」和「反對的」文化形構（2001: 55）。如果我們把張誦聖說的主流「軟性抒情的文學」連結到右翼，把現代主義連結到自由主義，把鄉土文學連結到左翼的位置，可能更能夠重新繪製一份地圖，標示出他們之間意識型態的差異，也更能看清楚軟性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現代主義文學與鄉土文學、鄉土文學與軟性文學之間的模糊地帶。⁸

另一方面，鄉土文學論戰裡除了讓被壓抑的左翼浮現，在「回歸鄉土」這個議題上，則首度爆發了「台灣結」、「中國結」的問題。⁹ 陳芳明指出，1978年「圍繞著葉石濤與陳映真的台灣文學史觀，台灣作家第一次以具體的『台灣文學』一詞，取代虛構的『中國文學』」（2000b: 53），「台灣文學」一詞首度「獲得澄清與定位」（2000b: 53）。而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到1979年台美斷交、中共與美國外交正常化以及美麗島事件的接連發生，則造成台灣政治生態的改變，催發了1982到1984年的統獨論戰。可以說，以1979年為分水嶺，自此之後，本土化和民主化成了擋不住的潮流，國府不得不順應此潮流而修正路線；儘管在此同時，它繼續透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強化大中國意識。蔣經國在半被強迫下有限度的寬容，使得八〇年代政治反對運動、環保運動和學運勃興，街頭抗爭活動不斷，乃至於「民主進步黨」在1986年成立，1987年國府宣佈解嚴。1990年幾萬名學生發動的「野百合」學運，提出解散萬年國會等訴求，更顯出新世代要求民主改革。文學在解嚴前尚未完全言論自由的八〇年代，再度扮演了催生民主的重要角色，小說家前所未有地敢於展現豐富的個人政治態度（林耀德 1994: 179）。林耀德便指出，從1979年黃凡小說〈賴索〉開始，政治小說成了八〇年代台灣小說的一大主流。他就八〇年代台

⁸ 不過，張誦聖的「主導文化」、「異向文化」、「反對文化」也許適用於解釋高壓的戒嚴文化，但並不適用於解嚴後，因為此時已無官方的操控。

⁹ 「台灣結」、「中國結」是借用馬森的話。楊照指出，鄉土文學論戰後期，「尤其是葉石濤與陳映真的論戰，讓人恍然驚覺到『台灣鄉土』究竟是『中國傳統』或『台灣本土性』的代表，原來是那麼難回答的一個問題」（1998: 18）。

灣政治小說中所流露的意識型態，將之分為七大類。¹⁰ 他暗指八〇年代以前政治小說以右翼統派為主流（1994: 171），而鄉土論戰前的鄉土小說基本上乃是「出之於本土情結的作品……卻未呈現強烈的獨派意識」（1994: 172），「八〇年代的新生事物」則是獨派政治小說和後現代懷疑論式的政治小說（1994: 173）。有趣的是，林耀德發現：促成政治小說勃興的文壇內部因素之一則是「新世代作家的變革」（1994: 149），這些新世代作家在意識型態上乃是與前代「斷裂的世代」（1994: 150）。於是不僅八〇年代政治小說的發展恰好與現實政治（運動）的發展互為表裡，新世代作家追求變革也呼應了前面所引用廖炳惠的看法：台灣社會「文化無意識的欲求，希望透過找尋某種對應架構，來理解台灣正形成的新社會想像」（2000: 92）。

林耀德自己是推動世代交替最重要的新世代作家之一，也是八〇年代中期到九〇年代中期後現代在文壇重要的推手，而他的視野針對的既是國內，也是國際：希望台灣小說家「面臨大陸作家在國際文壇所製造的聲勢」，依然能「在世界文學潮流中佔有一席之地」（1987: 23）。林耀德雖標榜後現代，但在1989年到1996年猝死前擔任「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秘書長期間舉辦一系列以台灣文學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又主編或與人合編台灣小說文選、大系，並大量撰寫與台灣文學史議題有關的評論，試圖讓台灣文學建制化，推動台北文化圈漸次以台灣文學取代中國文學的位移，林耀德的「後現代」計劃因此混雜著後殖民意圖。

三、翻譯的後殖民

如果後現代主義是翻譯過來的舶來品，那麼後殖民理論則比較貼近本土經驗。只不過台灣長遠、複雜的殖民與被殖民歷史使得來自印度、非洲、美國黑人等地學

¹⁰ 這七類是（1）左翼統派政治小說，（2）後現代懷疑論式的政治小說，（3）右翼統派政治小說，（4）後鄉土小說，（5）獨派政治小說，（6）女性主義小說，（7）原住民自覺文學（1994: 162-80）。林耀德承認他遺漏了八、九〇年代交替期間大量湧現的同性戀文學（1994: 179）。此外，林耀德擴充傳統對政治小說的界定，將女性主義小說和原住民自覺文學也納入其中，這點雖具洞見，但也引發疑問：此二類小說是否必然與統獨「左」「右」立場無關？是否必然與其他六類小說沒有重疊之處？答案則當然不是。就女性主義小說而言，正是在那些與其他六類小說有所重疊的小說中，可以見到性別與國族身分的糾葛。然而林耀德對八〇年代女性主義小說著墨不多、且略帶貶意，則不免讓人感到林耀德和大多台灣男性文學史家一樣將性別論述擺在國族論述之下。

者的後殖民理論也需要再詮釋。¹¹ 前面我已引過廖炳惠對於政治上台灣後殖民時期基於不同國族認同的不同解讀，並討論了本土化運動的發展脈絡。「台灣文學」由解嚴前的被噤聲到解嚴後各方爭奪解釋權的局面，也屬於本土化運動的一部分。1987 年，葉石濤出版《台灣文學史綱》，與政治上的解嚴有所呼應，1991 年，彭瑞金出版《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兩書均代表本土意識正式介入台灣文學史的書寫，促成「台灣文學」脫離「中國文學」而正典化。陳芳明由 1999 年開始撰寫新台灣文學史，則承先啓後，企圖讓台灣文學走出狹窄的本土論。然而本文一開始所討論的陳芳明與陳映真的論戰即已顯示有關台灣文學史書寫上的統獨之爭依然激烈。兩陳的論戰從 2000 年 7 月一直延燒到 2001 年 8 月。而在此之前，1999 年一月文建會委託聯合報副刊，評選「台灣文學經典」則引發台灣筆會強力反彈。該評選由王德威等七位學者提出 150 本參考書單，再由近百名大專院校裡教授現代文學及相關課程老師進行票選，選出 54 本後再由原來七名學者開會討論，選出 30 本。爭議之一是張愛玲的《半生緣》竟也列入「台灣文學經典」，爭議之二是本土派公認重要的作家如賴和、鍾理和等並未出現在書單中。關於第一點，張愛玲既未生於台灣，也未移居台灣，將她列為台灣作家，突顯大中國思想所導致的對於台灣文學定位的混亂。關於第二點，一方面是「經典」一詞太沉重，而名單又太少，另方面則是學院對台灣文學的瞭解仍十分侷限。林淇瀋（向陽）便指出，這項評選顯示「台灣文學的解釋權在學院內部仍然存在著傾斜現象」（2001: 273），使得某些重要作家在近百名教師票選那一關就被判出局，同時這也反映「台灣文學教育本土化（台文系所與研究者）的不足」（2001: 273）。

除了台灣文學解釋權上的爭議，二二八事件平反、李登輝、「認識台灣」教科書以及開放母語教育在本土化運動中亦扮演重要角色。在此我只談前面兩點。解嚴前幾個月，由民進黨發起的「二二八和平促進會」成立，促成 1988 年監察院公佈楊亮功、何漢文所做《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長期被國府官方噤聲的本土歷史終於可以公開討論，乃至 1995 年二二八事件獲得平反。這使得解嚴後出現了许多直接處理二二八的文學。李登輝則是本土化運動最重要的領袖，將國家路線由大中國中心改為台灣中心，也因此成了統獨鬥爭、族群衝突的主要焦點。他在總統及國民黨黨主席第一任任內，讓資深國代全部退職、國會全面改選、修憲、推動國際雙重承認以及重新加入聯合國，又改造國民黨為本土政黨，造成一批外省黨員於 1993

¹¹ 廖炳惠說台灣「一方面被忽視（明清）、割讓（甲午之役）、轉進占據（國民政府）或軍事侵略（中華人民共和國），另一方面則被當作列強與中國角力的場所（葡、荷、英、法等）、中日現代化的實驗地、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模範省』及中共的學習（或血洗）及統一目標」（2000: 94）。

年退出另外成立「新黨」。1995 年以中華民國總統身分訪問美國，引發中共飛彈試射，1996 年當選第一任民選總統後又利用日本殖民主義反制中共圍堵，並實施「戒急用忍」政策，1999 年他提出「特殊兩國論」，2001 年他抨擊國民黨為「外來政權」，在在引發爭議。拜解嚴之賜，針對這些爭議，不僅媒體和政論雜誌上出現論戰，也造成不同黨派立場的政治回憶錄和政治家傳記蔚然成風。

本土化運動有助於原住民（文化復振）運動和原住民現代漢語文學，也擴充了「本土」的概念。原住民運動，受到台灣黨外運動及全球原住民運動的啟發，¹² 始於 1983 年「高山青」雜誌。1984 年「原權會」成立，1987 年提出 17 條「台灣原住民族權利宣言」，1994 年「原住民」一詞正式載入憲法。由於從日治到國府，原住民受到嚴重壓迫而成了政經與文化的弱勢，面臨世代斷裂、流失母語與文化記憶的問題，卑南族孫大川便認為，原住民長久以來困在「黃昏處境」（1991: 118）。八〇年代中期，則「隨著台灣在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要求『本土化』的歷史形勢」，乘勢展開原住民自覺的政治抗爭運動（孫大川 1993: 97）。孫大川指出，原住民運動和閩、客籍的政治反對運動一樣，都以「政治、經濟壓迫背後的威權體系（國民黨政權）」為抗爭對象，不同在於原住民也反抗「那導致文化宰制的強勢文化（漢文化）」（1993: 101）。解嚴以後，原運隨著社會運動轉向於嘗試具體落實「本土文化建構的議題」，而有著更積極建構原住民主體性的努力（孫大川 1993: 98），也即是蛻變為原住民文化復振運動。許多原住民知識精英如泰雅族瓦歷斯·諾幹、二分之一排灣族利格拉樂·阿鳩、達悟族夏曼·藍波安選擇回到部落，重新學習傳統文化，寫下了田野調查和部落札記，夏曼甚至摹寫傳統的口述神話。孫大川便推崇瓦歷斯·諾幹在他的著作和行動中為原住民議題加強了文化、歷史的視野。¹³ 利格拉樂·阿鳩則加入性別視野：她批判原運裡缺乏女性的聲音，主流婦運無法顧及原住民女性的需求（1998: 71-73）。六〇年代排灣族陳英雄寫小說，為原住民現代漢語文學之始，八〇年代才陸續有布農族田雅各（拓拔斯·塔馬匹瑪）、排灣族莫那能等其他原住民作家跟進。瓦歷斯·諾幹指出，遲至 1988 年，原住民現代漢語文學才進入「主體建構的時期」（2000: 116）。此外，原運讓「本土」不再為閩、客專屬，甚至讓人重新思考「本土」的意含。早在 1993 年，以原住民題

¹² 前者的影響遠遠超過後者。

¹³ 孫大川稱許瓦歷斯·諾幹在〈一位原住民的文化大夢〉裡所提的六項文化建議：「（一）舉辦『原住民族文化營』；（二）成立『原住民文化基金會』；（三）成立原住民各族群語言中心；（四）創設『原住民藝術中心』；（五）重視各族祭典；（六）編寫原住民史」以及他的行動：「例如他創刊《獵人文化》，成立『台灣原住民人文研究中心』，舉辦各種原住民文化營隊，以及最近他積極投入泰雅族、卑南族的歷史探訪和撰述準備」（1993: 98）。

材寫小說的漢人作家舞鶴在《文學台灣》季刊上與楊照對談時，便暗指「本土」乃台灣地理空間；他批評所謂台灣「本土」觀點經常是「西海岸的幾個大都市」的觀點，缺乏對台灣其他地區，尤其原住民歷史文化的深度瞭解（王麗華 1993: 128）。

相對於原住民運動、原住民現代漢語文學倚靠著本土化運動的形勢而有著突破性的發展，某些外省人（尤其某些眷村子弟）卻因著本土化運動而感受到在文化、政治及社經上的相對失勢，以此爆發出危機意識，然而在這背後又有濃厚的外省人文化優越感。於是他們特別針對本土化運動潛在的福佬中心立場提出抨擊，但他們同時又必須與「台灣」、「中國」等概念重新協商，於是質疑並爭奪「本土」概念的內涵，並反思「中國」的意含。畢竟不但自 1979 年退出聯合國後「反攻大陸」已不可能，而且 1988 年開放大陸探親兩岸交流、九〇年代以來中共對台灣的圍堵和武力威脅也都讓教科書裡所灌輸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想像愈來愈背離現實；大家愈來愈認知到「中華民國」的國土幾乎等於台灣。連統派的呂正惠都發現，新世代知識分子「很難再成為中國民族主義者」：「他可以認同於他自己『理想』中的中國，而不認同於現在的『中國』；也可以乾脆不認同任何形式的中國……而只認同於台灣」（1995: 34-35）。不過，大中國情結依然使某些人不願認同「台灣」和「台灣人」。由於教科書和主流媒體仍是大中國中心，「文化中國」雖可以區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卻仍與舊有的「中華民國」概念疊合，形成大中國意識。廖炳惠指出，蔣介石透過以北京話為國語的政策及培植外省人的特權系統將大部分台灣人排除於中心之外，造成 1949 年以來「台灣的文化資本與象徵資本一直都操在外省人手裡」，因此即使台灣人接掌政權，也並未順利取得政權和文化霸權；本土化繼續和大中國情結交戰（1994: 310, 309）。這點在歷次總統大選以及李登輝和陳水扁就任總統後激烈的政爭和對立衝突裡都可清楚看到。此外，就二二八事件雖已獲得平反，迄今卻尚未追究加害者，亦可看出懷有大中國情結的外省人迄今不願意面對本土歷史。解嚴後，包括李昂、朱天心、平路、舞鶴、施叔青、朱天文、宋澤萊、田雅各、夏曼·藍波安、楊照、駱以軍、陳燁、袁瓊瓊、賴香吟、蘇偉貞在內不同族群的許多作家熱烈投入邱貴芬所說的「國族打造」書寫，推出「標榜族群立場歷史記憶小說」（邱貴芬 1997: 38）。這些小說蘊含了對台灣歷史詮釋權的爭奪，也涉及對於台灣歷經多次殖民錯亂的國家與文化身分認同之重新思考。其中尤其以李昂、舞鶴、宋澤萊、施叔青、田雅各、夏曼·藍波安、楊照、賴香吟、陳燁、平路最具後殖民視角。

在這樣的背景下，約在 1991 年前後引進的「後殖民」，¹⁴ 便和「後現代」相

¹⁴ 出身印度的後殖民學者史碧娃克（Gayatri Spivak）曾於 1989 年訪台，但並未提到後殖民。

當不同的，從一開始就發展出「它的問題性」，且與「後現代」牽纏。1991年，廖朝陽以林強專輯《向前走》為例，分析台灣發展出的文化雜燴，¹⁵ 有些乍看是後現代拼貼、歌頌台北，其實具有對城鄉互動的反省與深度，因此是巴巴（Homi Bhabha）所說弱勢文化戴上面具對強勢文化的「學舌」，曲折地表達批判和反抗。但他又認為，「學舌」的顛覆性有限，最終仍須建立文化主體性（1991）。1992年，同是本土派的邱貴芬與廖朝陽在全國比較文學會議裡及會外持續辯論。邱貴芬勾連後殖民與後現代的「抵中心」傾向，試圖藉由強調多元異質文化，建構新的台灣「命運共同體」（1995a: 238; 1995b: 270）。她一方面援用西方後殖民理論，抵制傳統中國中心文學史觀，重建台灣文學典律的理論思考，另方面則「反對『本土』被化約為福佬以及本土運動潛在的『福佬沙文』傾向」，因此挪用巴巴「混雜」、「學舌」的概念，主張台灣的國語「可視為『台灣的』語言」，「不必斥之為『外來語』而敵視之」（2003a: 266）。¹⁶ 廖朝陽則擔心被殖民者的抗爭被收編，他引佛斯特（Hal Foster）認為跨文化雜燴乃是後現代的妥協的論點；由於邱貴芬視國語為台灣的語言並反對本土運動回歸本源，他便批評邱接受殖民者的語言和文化暴力（1995a; 1995b）。1995到1996年《中外文學》期刊上，陸續有多位學者就國家、族群認同議題激辯，後來演變為廖咸浩和廖朝陽的統獨論戰。時值中共試射飛彈期間，廖咸浩認為台灣獨立將引發戰爭，並批判獨派具福佬沙文主義傾向，台灣意識迫害閩南以外族群，因此主張中國「文化聯邦主義」（即「文化中國」）概念即已具多元文化主義的雛形（1995）。廖朝陽則以接近後現代流動身分論處理台灣主體性。他引齊傑克（Slavoj Žižek），提出「空白主體」論，主張主體的內容隨環境變化而不斷移出移入，因此後殖民身分乃是流動的（1995c: 118-21）。他並批判廖咸浩將一切問題歸給台獨，但廖咸浩所謂排他性的台灣意識始終不構成宰制，因為「某種版本的中國文化仍是台灣社會的主導力量」（1995d: 118）。邱貴芬認為這次長達一年半多的辯論不但「使後殖民理論進一步在地化」，並顯示「台灣後殖民論述並不同於本土論述」，因為不論本土派或其對立的一方都可挪用後殖民理論（2003a: 271）。我則認為本土派遠比其對立的一方勇於反思和自我批判，後者不肯批判中國中心主義以及將虛幻的中國意識強加於台灣之邏輯問題，因此其精神乃是反對後殖民的（參看Liao 1999: 205-06）。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¹⁵ 廖文中譯為「複質文化」，本文為求譯名統一，此處仍用「文化雜燴」。

¹⁶ 借用巴巴的概念，邱貴芬認為「已結合台灣這四十多年歷史經驗的『北京話』事實上已是台灣特有的混種語言」（1995b: 268），而「台灣話也不專指福佬話。台灣話事實上包括了福佬話、原住民語、客家話，以及『北京話』」（1995b: 270）。

以上的討論雖屬於學院精英，然而它們一方面將瀰漫於解嚴後公共空間有關國族的爭論加以理論化，另外又開發新的議題，深化思辨，形成學界與文化界的新文化運動。在此需再釐清台灣的後殖民與後現代，兩者雖有混雜牽纏，但基調仍相當不同且互相角力。後殖民基本上延伸強化了台灣本土化運動的理論面向，並加入了「殖民擬仿」。後殖民去除中國中心，而以台灣中心歷史觀出發，挖掘原住民以及閩、客、外省等不同時期移民的歷史記憶，探討台灣歷經多重殖民的創傷、對新舊殖民主義的交涉挪用以及殖民遺產轉化至今的影響，藉此重構國家和族群身分。後現代則強調跨國雜燴、表層、商品化、戲耍和表演性，迴避國家認同和歷史記憶議題。後現代標舉多元異質、身分流動、去歷史深度、懷疑論，擺出「後國家」的姿態，藉此解構主體性。林耀德促成台北文化圈以台灣文學取代中國文學的位移，在其後現代計劃中含有些微後殖民意圖，但這畢竟是少數。更多標榜後現代的論述者與作家往往刻意以後現代回應後殖民，側面抵制或消解後殖民的力道，而這背後隱含了其外省族群立場。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當性批判派女性主義者擔任民進黨政府公職時，竟引來標舉後現代的性解放派女性主義者攻擊她們是「國家女性主義者」；當性批判派女性主義者構想一個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福利國家，讓「照顧」國家化，讓「社區媽媽」重新聯繫社區感情時，性解放派女性主義者又抨擊這個構想重新收編同性戀、變裝癖、妓女等（林芳玫 1998；Liou 2004: 126）。另一個例子是朱天文《荒人手記》（1994）裡敘述者因為李登輝當上總統而憤懣憂鬱，逃遁在後現代商品廣告與漫畫的拼貼裡，以後現代消解後殖民。

四、多元身分認同

緣於後殖民關注於重構國家和族群身分，而後現代則一方面強調多元異質，另一方面耍玩身分流動、對身分認同抱持懷疑，因此後殖民與後現代的匯集便又激盪出多元身分認同，乃至於身分認同（從國家、族群、鄉土、到性別、性取向）成了解嚴後文學的一大主題。前面已探討過本土化運動所涉及的交鋒、對原住民運動的影響、以及原住民運動內部的各種聲音，九〇年代如火如荼的女性運動和同志及酷兒運動其內部與之間也有許多論戰。女性主義運動遠在 1971 年呂秀蓮喊出「新女性主義」口號，強調「先做人，再做女人」便已萌芽，然而卻直到 1987 年以理論、論述見長的「婦女新知」基金會成立，發行《婦女新知》月刊及女性主義書籍，才

站穩腳步。¹⁷ 解嚴後，原本勢力薄弱的女性主義運動迅即蓬勃，「原因之一是，1987 到 1989 年之間第一波民主化的成功，提供了社會運動更大的空間。另一因素則是，大眾想從對國家身份議題的統獨之爭中得到喘息」（劉亮雅 2003: 65）。九〇年代初，歐美第二波女性主義的各派不旋踵皆登陸台灣，1994 年一群台灣女學者所合寫的《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可謂具體結晶。各派中，性批判派以及標榜後現代的性解放派和酷兒派女性主義尤其銳利，在引介與本土化過程中，各派之間有各種交鋒與結盟關係。大體上，性批判派如劉毓秀、林芳玫致力推動法律、教育、職場、意識上的男女平權，例如反性騷擾、反性暴力、反色情、反雛妓，劉毓秀去父姓改從為母姓。性解放派如何春蕤、丁乃非則強調女性情慾解放，何春蕤的「豪爽女人」、「好色女人」觀讓情慾（或者應說性意識〔sexuality〕）議題漸成運動主軸，各種論戰維持女性議題在媒體上的強勢與熱度。像悍婦、淫婦等傳統上的貶詞甚至被直接翻轉，以便向父權挑釁。1996-97 年彭婉如遇害及白曉燕撕票案讓婦女人身安全落實為重大公共議題，但性批判派與性解放派的路線之爭則愈演愈烈，終於以廢公娼與反廢公娼一案正式決裂。性批判派反對色情及娼妓制度剝削、物化女人，性解放派則認為色情是好的、必須的，性工作者的權益需要保障。¹⁸ 就女性自主而言，性批判派認為不應以情慾為人生中心，情慾關係需權力對等且以愛情為基礎，才能保障女性情慾自主；性解放派則聚焦於女性情慾，且認為女人要性，未必要愛情。單就兩派的論戰，雖都強調女性（情慾）自主，定義卻不同。若再加上酷兒派強調同性情慾流動，女同志派標舉女同志身分，阿媽批評主流婦運不能照顧原住民女性的需求，江文瑜重視不同族群、階級祖母的口述史，以及邱貴芬探討性別與國族的糾葛，則更顯現女性身分的多元性（參看劉亮雅 2000）。女性主義對性別的反思並促成了像王浩威、蔡詩萍的新男性論述。九〇年代包括章緣、賴香吟、李昂、平路、施叔青、朱天心、朱天文、蔡素芬、成英姝、洪凌等作家都投入了女性意識小說的書寫。

解嚴前，同志運動僅限於 1983 年白先勇《孽子》一書的出版和防治愛滋病運動。九〇年代以來，則藉由引進西方同志和酷兒理論、與女性主義運動合作等方式推展，張小虹是最重要的推手之一。礙於出櫃困難，女同志與酷兒運動起初寄身於

¹⁷ 1982 年李元貞等人創辦《婦女新知》雜誌社，1987 年李元貞擔任「婦女新知」基金會首任董事長。

¹⁸ 性解放派對權力關係過度天真。我曾指出，何春蕤「刻意忽略有些色情裡攙雜大量性暴力、灌輸女人喜歡被性虐待等仇視女性的問題」（劉亮雅 2000: 175），此外，「性解放派認為娼妓為普通行業，對青少年卻可能誤導」（劉亮雅 2000: 175），畢竟「此一行業人身安全風險太大、對身心的折損太高」（劉亮雅 2000: 175）。

女性主義運動，在性批判派與性解放派之間左右逢源。1990年，第一個女同性戀團體「我們之間」成立，出版《女朋友》雜誌；1994年，洪凌、紀大偉與但唐謨主編《島嶼邊緣》的「酷兒專號」，打出酷兒運動旗號。然而，酷兒評論早已出現在梁濃剛的《快感與兩性差別》（1989）與張小虹的《後現代／女人》（1993）。同志運動提出正面、穩定的同性戀身分，酷兒運動則強調性別與性取向身分的流動性，都挑戰了主流社會的異性戀中心；廣義的同志運動也包含酷兒運動。約在1995年到96年間，女同志和酷兒運動與男同志運動形成新的聯盟。1996年，同志空間行動陣線發動一連串戴面具抗議行動，反對台北市政府將新公園改成二二八公園，而與台灣民族主義發生不幸衝突。改名象徵官方遲來地承認二二八事件那段創傷歷史，並紀念死難者，但卻也象徵性地抹去新公園過去做為男同志公開交媾的空間之記憶。雖然決議並沒有被推翻，抗議行動卻成功地喚起大眾記憶（參看張小虹）。但這個事件導致女同志及酷兒女性主義者與主流女性主義者之間的齟齬，以及部分人士出走另組同志組織。不同於歐美，台灣公開出櫃的同志並不多，但藉由媒體報導和論戰、同志刊物、學院裡的學術會議、大專社團、網路、同志影展等，同志和酷兒運動卻極其蓬勃。同志和酷兒文學也因而盛況空前。同志小說的好手包括邱妙津、陳雪、曹麗娟、洪凌、凌煙、朱天文、紀大偉、吳繼文、李昂；酷兒小說好手包括紀大偉、洪凌、邱妙津、陳雪。

異乎原住民運動，女性主義運動（尤其性解放派和酷兒派）和同志與酷兒運動經常援引歐美先例，在策略上最貼近弱勢跨國聯盟，雖然它們仍展現了在地性，例如性解放派探討檳榔西施，同志運動追懷新公園的男同志空間。由於運動者的年輕，除了耍玩語言遊戲，運動的方式常帶有嘉年華的活潑輕鬆，例如舉辦街頭行動劇和「同志夢中情人」票選活動。同時它們也相當程度利用了跨國資本主義慾望邏輯，讓有關性解放、同性戀、酷兒的身體論述與時尚、商品結合，成為都會新興流行風，從而化解主流社會的敵意。例如「豪爽女人」，又例如由香港華人率先使用的「同志」一詞，挪用了政治性語言，「酷兒」、「蕾絲鞭」二詞分別翻譯自英文queer、lesbian，去除英文原先脈絡，都刻意閃避恐同壓力，而變成通行於媒體的時髦語。等到運動站穩腳步後，才改採挑釁挑逗的「怪胎」、「變態」、「發妖」、「桃花女」。然而，也正因為它們與商品邏輯合作，有時也削弱了它們的基進性，而易於被主流收編。2000年後酷兒和性解放運動走向衰頹，與此有關，也顯示此種操作方式的一刀兩刃。

在語言層次上，即使解嚴後，國語仍維持公共領域的獨佔優勢，母語運動最多只能在學校裡增設母語教育。然而國、台、外來語的雜糅和雙關語、新語詞的流行，

瀰漫於公共空間、媒體、網路，例如：「LKK」、「SPP」、「A錢」、「嗆聲」、「粉美麗」、「膨風」、「龜毛」、「機車」、「阿答馬秀逗」、「作秀」、「假仙」、「偶像——嘔吐的對象」、「麻吉」，一方面顯現新人類的反傳統以及青少年文化、庶民文化、選舉文化的蓬勃，另方面也顯示後現代耍玩展演結合了後殖民——不再獨尊純正北京話。¹⁹ 雖然或許有人認為外來語代表（新）殖民主義，但這原也是後現代的一部份。

後現代與後殖民的混雜還可見於「馬華文學」的建制化。自黃錦樹的《馬華文學與中國性》（1998）一書標舉「馬華文學」後，過去被模糊放在「中國文學」裡且被「大中國的視域」投以同情或鄙視的馬華文學（黃錦樹 1998: 134）突然「去殖民」，彰顯一向強調大一統的「中國文學」內其實混雜了不同地區華人的文學。黃錦樹嘲諷台灣的大中國想像乃是國府撤守來台後的自我膨脹扭曲，因此產生了略具國民身分的「僑生」；「馬華」的國族身分和主體性卻被忽視（1998: 31）。由於馬來西亞政府在政治和文化上打壓華人，使華人產生失語危機，而更強調複製中國傳統。但黃錦樹以摻雜後現代擬像觀的角度分析：此種「中國性」已被戀物化、商品化，成為「文化表演」（1998: 117, 115）。他進一步認為這乃是複製晚清知識分子章太炎在現代性衝擊下對「中國性」的嚮往，兩者都「難掩戀屍的癡候群」（王德威 2001: 19）。我想這點大概也適用於台灣，因為他說馬華和台灣人的「中國經驗」都只是「一種文化想像」（1998: 33）。此外，他反省華人和馬來人種族隔離、互相封閉的悲哀，並似乎暗指華人的文化優越感，以致一直沒有接納馬來人和馬來文化（1998: 135）。這似乎也可以部分解釋在台的馬華文學以「中國性作為一種戀物式的前提」，與台灣經驗嚴重疏離，因而「比外省第二代作家更具『外省性』（1998: 34）。由於在台的馬華文學從李永平、張貴興到黃錦樹、陳大為等已形成文學傳統，不少作家長住台灣，也頗受重視，另一些問題是：它與台灣有何關聯？對台灣文學有何參照點？可以被視為台灣文學的一部份嗎？我認為馬華文學描寫的非馬非華、亦馬亦華經驗和台灣文學裡描寫的被殖民經驗有類似處。而已歸化台灣的馬華作家似乎也可以視為台灣作家。在台的馬華文學提供了豐富的跨國文化異質想像，也突顯了「中國性」的問題性。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¹⁹ 這點正可印證邱貴芬的洞見（或者應說王禎和在《玫瑰玫瑰我愛你》裡的洞見），參看註 16。

五、媒體與出版業生態

探討後現代與後殖民熱潮，不能不談參與其中的媒體與出版業所扮演的角色。解嚴後媒體與出版業生態的改變，文學也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衝擊。在三張報時代，副刊地位重要，吸引大批文學閱讀人口。六〇年代《現代文學》雜誌以同人誌方式出版，完全不受媒體及市場導向影響，畢竟是特例。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分別於1976和1978年成立文學獎，炒熱了文學，新手幾乎一得獎便可出書成名。1988年報紙解禁，兩大報的霸業漸損，而報紙大幅增張，更削弱了兩大副刊的影響力。報業競爭使得政治社會議題及有關影視體育、民生消費等通俗文化成為重點。縱使副刊增張，純文學的閱讀人口依然逐年減少。近十年來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改走文化議題路線，即反映社會需求的改變。雖然兩大報的文學獎直到九〇年代末都仍是作家晉身的指標，然而2000年以來這種盛況卻不再。再加上1993年通過「有線電視法」，1995年有線電視普及率已達70%，錄影帶、網路的流行，電子化時代來臨，視聽影像大有取代紙本之可能。電視媒體的競爭更使電視新聞綜藝化，為了收視率而炒作新聞。在這樣的文化生態下，文學有的朝通俗、大眾路線走，有的則更關注政治社會議題，探討身分政治、通俗文化、歷史記憶、甚至文化史。嚴肅文學和大眾文學的界線較為模糊，但大致上嚴肅文學會挪用、吸納推理小說、驚悚小說、羅曼史、科幻小說等類型文學，使其關懷面更廣，美學實驗也更豐富；有些嚴肅文學更朝個人風格化的書寫方式。

後現代與後殖民主導文化下的多元、去中心，一方面使文學受到某種程度擠壓，另方面也刺激更多文學獎的成立。在兩大報文學獎外，原已有官方的中國文藝學會文藝獎、中山文藝創作獎和國家文藝獎，本土派的吳濁流文學獎和吳三連文藝獎，及中央日報與《明道文藝》合辦的全國學生文藝獎。²⁰ 解嚴後則又有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央日報文學獎與本土派的賴和文學獎分別於1987、1989和1992年開辦，本土派的自立晚報在1990年辦了一屆百萬小說獎，中國時報在1994、1998、2000年辦了三屆百萬小說獎，皇冠雜誌的大眾小說獎和華航旅行文學獎分別於1996和1997年成立，更不消說林林總總一些屬於大學或縣市的文學獎。這些獎項提供新人更多成名管道。文學獎以外，報章上的書評版也成了文學被認可、引介的途徑，儘管隨著書的種類愈來愈五花八門，文學書評的比例也相對降低。中國時報與聯合

²⁰ 分別創立於1960、1966、1975、1970、1978和1981年。

報分別於 1988 和 1992 年開始每週發行「開卷」和「讀書人」書評版，誠品書店的書評雙月刊《誠品閱讀》創刊於 1991 年（1996 年停刊後又於 2000 年發行月刊《誠品好讀》），這些書評刊物每年年底推出十大最佳好書，既成了文學經典化的環結，也有助於文學銷售。學術期刊如《中外文學》、《當代》²¹上有關台灣文學的論文，文學雜誌如《聯合文學》、《文訊》、《文學台灣》²²上的書評也都很重要。新世代作家幾乎都靠文學獎出名，出書後則仰賴書評。

出版生態和媒體一樣變得更多元。解嚴後書店朝連鎖店和專門店兩個方向發展。繼金石堂書店於 1983 年創立後，誠品書店於 1989 年成立，比金石堂更精緻、分類更專門。異於這類連鎖書店的企業化，則是走小眾路線如台灣今店、女書店和晶晶書屋分別於 1993、1994 和 1999 年成立，專賣本土、女性或同志書籍。連鎖書店有資金週轉問題，²³ 更需促銷。金石堂書店率先走大眾路線，在其每週銷售排行榜上分「文學類」、「非文學類」兩類；「文學類」方面混雜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前者往往很少出現。近年來在誠品書店「現代中文創作」欄書架上也同樣混雜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顯示通俗文學廣大的讀者群，相形之下嚴肅文學成了小眾。解嚴後出書暴增，但增加的是傳記及私人回憶錄、政論書、心靈勵志書、旅遊書、台灣文史研究、性別論述、原住民論述、社會運動書、羅曼史、管理書、電腦資訊書等，文學市場在這樣空前龐大的書海裡顯得萎縮。出版社爲了刺激純文學消費，採取資本主義行銷方式，包括議題取向及照片包裝、新書發表會、報章報導、名家推薦方式促銷。「美女作家」和影射小說都成了賣點。然而也有逆向操作，強調文學經典，例如爾雅、聯經、前衛、九歌都出版年度小說及其他文類的選集。前衛的「台灣作家全集」五十冊，由鍾肇政擔任總召、不同學者編選導讀，於 1990 至 1993 年出版。王德威主編導讀、麥田出版的「當代小說家」系列十九本，由 1996 年出到 2001 年，包含兩岸四地（台灣、中國、香港、星馬），其中台灣作家便至少有八位；2001 年聯合文學爲朱天心推出九本作品集。

另一方面，後現代與後殖民主導文化下，出版生態的改變也隱然影響了作家的取材、視角和風格。例如民間學者對有關二二八、霧社事件遺眷的訪談彌補了官方歷史的嚴重不足。而政治熱引發的傳記及政治回憶錄熱潮則讓人人都可以寫歷史，不同立場黨派的歷史記憶互相衝突對抗，企圖影響當前及未來台灣政局，使得歷史成了「建構現在、掌控將來的資本」（邱貴芬 1997: 202）。而這不僅促使政治身分

²¹ 分別創刊於 1972、1986 年。

²² 分別創刊於 1984、1983、1991 年。《文學台灣》的前身是 1982 年創刊、1989 年停刊的《文學界》。

²³ 2001 年，金石堂書店和誠品書店在台灣分別有 100 家和 35 家分店。



成爲解嚴後文學的一大主題，也引發記憶是否遭操控、扭曲、遺忘，歷史書寫是否摻雜虛構等問題的公共討論。此外，摻雜八卦、秘辛和療傷的私人回憶錄之風行則似乎刺激文學走向私小說，雖然日本私小說的翻譯以及八卦雜誌也有刺激作用。不少出版社以書系方式大量推出女性主義、同性戀、原住民論述，從理論、口述史、田野調查到評論，既肯定社會運動的重要性，也顯示市場需求，而這也刺激有關女性、同性戀、原住民題材文學的興盛。非但如此，理論、思辯的增加，各種版本的大歷史、小歷史的出現，似乎也刺激小說文體走向議論性和辯證性，以便「反映時代」。像舞鶴、朱天文、朱天心、施叔青、駱以軍，有的經由大量考證，有的糅雜、改寫各種論述，則讓他們的小說呈現「百科全書」式文體，具有文化史的面向。

六、結 語

後現代與後殖民的台灣演繹，見證了文化翻譯在解嚴以來特殊時空下的龐大生產力。與其說這只是對西方思潮的模仿學舌，不如說透過激烈的論戰，它們的問題性都被發揚或釐清。後現代與後殖民的熱潮，連結了台灣當時內在的匱缺和欲求：八〇年代以來經濟繁榮卻被邊緣化爲國際孤兒的窘境，以及 1979 年美麗島事件所促發的政治反對運動和本土文化運動，使得國民黨中國中心的威權政治失去正當性。翻譯後現代與後殖民是在文化無意識層面希圖終結威權政治，促進多元文化實踐，建構市民社會，並找尋台灣的國家定位。而在媒體與出版業的推波助瀾下，翻譯後現代與後殖民所引發的議題、效應和影響，它們之間的交鋒，以及與它們所激盪出的多元身分認同，甚至社會運動，更使它們主導了解嚴以來的文化與文學。

※ 本文為國科會三年期整合型計劃「台灣女性小說史——後現代與後殖民：1987 年以來的台灣女性小說（1/3）」（編號 NSC 92-2411-H-002-106-AE）、「台灣女性小說史——後現代與後殖民：1987 年以來的台灣女性小說（2/3）」（編號 NSC 93-2411-H-002-017-AE）及「台灣女性小說史——後現代與後殖民：1987 年以來的台灣女性小說（3/3）」（編號 NSC 94-2411-H-002-004-AE）部分成果，初稿曾發表在靜宜大學台文系與中文系主辦的「台灣女性小說史」第一次成果發表會。2004 年 5 月 21 日。感謝助理廖勇超、黃山耘、王梅春、周盈秀幫忙蒐集資料。

引用書目

- Liao, Ping-hui. 1999. "Postcolonial Studies in Taiwan: Issues in Critical Debates." *Postcolonial Studies* 2.2: 199-211.
- Liou, Liang-ya. 2004. "Cultural Studies in Taiwan." *Cultural Studies in Asia*. Ed. Seong-Kon Kim and Alec Gordon. Seoul: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113-42.
- Spivak, Gayatri C. 1993.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London: Routledge.
- Williams, Raymond. 1983 (1976).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Rev. ed. New York: Oxford UP.
- 王德威。2001。〈壞孩子黃錦樹——黃錦樹的馬華論述與敘述〉。《由島至島》。黃錦樹。台北：麥田。11-35。
- 王麗華。1993。〈文學的追求與超越——舞鶴、楊照對談錄〉。《文學台灣》8（10月）：116-58。
- 瓦歷斯·諾幹（尤幹）。2000。〈關於台灣原住民族現代文學的幾點思考〉。《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周英雄、劉紀蕙編。台北：麥田。101-19。
- 呂正惠。1995a。〈七、八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的源流與變遷——政治、社會及思想背景的探討〉。《文學經典與文化認同》。台北：九歌。65-85。
- 。1995b。〈戰後台灣知識分子與台灣文學〉。《文學經典與文化認同》。15-38。
- 利格拉樂·阿鳩。1998。《穆莉淡——部落手札》。台北：女書文化。
- 林芳玫。1998。〈當代台灣婦運的認同政治：以公娼存廢爭議為例〉。《中外文學》27.1（6月）：56-87。
- 林淇瀟。2001。〈解釋權的斷層差異：1999年台灣文學傳播現象觀察〉。《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台北：麥田。269-81。
- 林耀德。1987。〈末世紀的小說策略——和張大春對話〉。《金石堂文化廣場月刊》25、26（1月）：22-25。
- 。1994。〈小說迷宮中的政治迴路——「八〇年代台灣政治小說」的內涵與相關課題〉。《當代台灣政治文學論》。鄭明嫻主編。台北：時報。135-99。
- 林耀德、孟樊。1990。〈總序：以當代視野書寫八〇年代台灣文學史〉。《世紀末偏航》。林耀德、孟樊主編。台北：時報。5-12。
- 邱貴芬。1995a。〈「發現台灣」：建構台灣後殖民論述〉。《典律與文學教學》。陳東榮、陳長房編。台北：書林。233-53。
- 。1995b。〈「咱攏是台灣人」——答廖朝陽有關台灣後殖民論述的問題〉。《典律與文學教學》。259-76。
- 。1997。《仲介台灣·女人：後殖民女性觀點的台灣閱讀》。台北：元尊。
- 。2003a。〈「後殖民」的台灣演繹〉。《後殖民及其外》。台北：麥田。85-99。
- 。2003b。〈評李桂芳〈意識的「偵防」與歷史的「災難」——從陳映真與陳芳明的論爭說起，並兼論「台灣文學史建構論」的問題〉〉。第二十七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2003年5月10日。東吳大學。
- 孫大川。1991。〈活出歷史——原住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久久酒一次》。台北：張老師文化。108-26。
- 。1993。〈原住民文學的困境——黃昏或黎明〉。《山海文化》1（11月）：97-105。
- 張小虹。1996。〈同志情人·非常慾望：台灣同志的流行文化出擊〉。《中外文學》25.1（6月）：6-25。

- 張誦聖。2001。《文學場域的變遷》。台北：聯合文學。
- 陳光興。1990。〈炒作後現代？——評孟樊、羅青、鍾明德的後現代觀（上）（下）〉。
《自立早報副刊》2月23、24日。
- 陳芳明。2000a。〈馬克斯主義有那麼嚴重嗎〉。《聯合文學》190（8月）。156-65。
- 。2000b。〈後現代或後殖民？：戰後台灣文學史的一個解釋〉。《書寫台灣》。41-63。
- 陳映真。2000。〈關於台灣「社會性質」的進一步討論〉。《聯合文學》191（9月）。138-61。
- 黃錦樹。1998。《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台北：遠流。
- 。2003。〈謊言的技術與真理的技藝——書寫張大春之書寫〉。《謊言或真理的技藝：當代中文小說論集》。台北：麥田。205-39。
- 彭瑞金。1991。《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
- 楊照。1998。〈台灣戰後五十年文學批評小史〉。《夢與灰燼——戰後文學史散論二集》。台北：聯合文學。11-49。
- 葉石濤。1987。《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
- 廖炳惠。1994。〈重寫台灣史——從二二八事變史說起〉。《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台北：麥田。303-28。
- 。2000。〈台灣：後現代或後殖民？〉。《書寫台灣》。85-99。
- 。2001a。〈比較文學與現代詩篇〉。《另類現代情》。台北：允晨。113-36。
- 。2001b。〈後殖民研究的問題及前景：幾個亞太地區的啓示〉。《另類現代情》。247-85。
- 廖咸浩。1995。〈超越國族：為什麼要談認同？〉。《中外文學》24.4（9月）：61-76。
- 廖朝陽。1991。〈誰給林強騙去啦？：參差發展中的複質文化〉。《自立早報副刊》12月20、21日。
- 。1995a。〈評論〈發現台灣：建構台灣後殖民論述〉〉。《典律與文學教學》。陳東榮、陳長房編。台北：書林。254-58。
- 。1995b。〈是四不像，還是虎豹獅象？——再與邱貴芬談台灣文化〉。《典律與文學教學》。277-91。
- 。1995c。〈中國人的悲情：回應陳昭瑛並論文化建構與民族認同〉。《中外文學》23.10（3月）：102-26。
- 。1995d。〈關於台灣的族群問題：回應廖咸浩〉。《中外文學》24.5（10月）：117-27。
- 劉亮雅。1998。〈擺盪在現代與後現代之間：朱天文近期作品中的國族、世代、性別、情慾問題〉。《慾望更衣室：情色小說的政治與美學》。台北：元尊。17-41。
- 。2000。〈台灣女性主義文化批評 1990-1999〉。《文化研究在台灣》。陳光興編。台北：巨流。172-81。
- 。2003。〈在全球化與在地化的交錯之中：白先勇、李昂、朱天文和紀大偉小說中的男同性戀呈現〉。《中外文學》32.3（8月）：63-78。

劉亮雅，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